《准噶尔史略》读后

成崇德　　潘向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部分同志合作编写的《准噶尔史略》一书(以下简称《史略》)，已由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12月出版。全书共分六章，以清代准噶尔史为主，并溯及明代瓦剌和元代斡亦剌的历史活动。本书是我国厄鲁特史研究领域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通史性专著，它的出版必将促进我国学术界对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工作。

有关准噶尔史的文献史料有多种文字，包括汉、蒙、藏、满、托忒、察合台、维吾尔，俄罗斯文，而且在其历史的不同时期所保存下来的史料情况也各不相同，某些时期的史料卷帙浩繁，而另些时期则又失之缺乏和零散，给准噶尔史的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史略》编写组的同志们克服困难，调查研究，为开拓我国准噶尔史研究的新局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在向读者奉献了一批有独立见解、有科学价值的学术论文的基础上，编写了这部《史略》。

准噶尔史的时间起迄，自其先祖斡亦剌出现于政治舞台，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土尔扈特东返祖国，共计七百余年，历经元、明、清三朝。其活动范围，东起辽河流域，西抵伏尔加河流域，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漠南北和中亚地区。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准噶尔史的研究要涉及元史、明史、清史，还涉及中亚史、中西交通史和中俄关系史等学术领域。如众所周知，对于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早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国内外有关学者就已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由于准噶尔问题曾极大地影响清代康，雍、乾三朝西北边疆的稳定，甚至西藏的安危也与准噶尔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引起清朝统治者和某些经世致用学者的极大关注。乾隆中叶以来，多有学者对准噶尔史的研究用力甚勤，在奉敕编撰的《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等文献中，载有经过整理考订的有关丰富史料，椿园(七十一)著《西域闻见录》中也对此有一定考察，而祁韵士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皇朝藩部要略》则颇具代表性，张穆、何秋涛著《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等书，亦均有论述系统，考证精当的研究成果。清代学者的这些成就为我们今天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清末以至民国年间，学术界对于准噶尔史的研究却处于沉寂冷寞状态，据认为此期国内发表的涉及准噶尔史的六十余篇论文中，专以准噶尔史为研究对象的仅有一篇。全国解放后一段时期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一领域的进展仍无大起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准噶尔史诸多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史略》编写组的同志们博采众家之长，在我国边疆民族史研究领域可谓独树一帜。

首先，本书以国内第一部通论准噶尔史的专著，深入系统地向读者展现了自斡亦剌到清代乾隆年间的西蒙古历史发展的画面。这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富有立体感的历史画面，它不但从纵向追溯了清代以前准噶尔先祖的有声有色的生产和政治活动，更主要的是，它以清代准噶尔史为重点，从横向比较详细地描绘了该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等各个

面。清代前期，是准噶尔史的全盛时期，也是作者用力最勤之处。在以往的某些史学著作论文中谈到清准关系，多是叙述两者之间的战争，以为清政府与西蒙古各部之间只有相互杀和相互侵夺，清朝与准噶尔民族政权的关系是一部“清朝平准战争史”。而《史略》以实的史料说明了清代前期勤劳、勇敢的西蒙古各部人民，如何在抗拒沙皇俄国蚕食和压迫同时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的事实，他们除了继续经营传统的畜牧业和狩猎业，还吸收农业族的先进文明，栽植作物，饲养家禽，建立居民点，发展手工业，并积极开展同中原人民俄国、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准噶尔人民在开拓祖国边疆过程中的才智贡献。尽管清初我国西北一隅曾出现分裂局面，并有兵戎相见，但从清代准噶尔的全部史来看，他们与国内其他民族之间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共同缔造和发展了我国统一的多族国家，这是准噶尔蒙古民族同国内其他民族、主要是中原人民相互关系的主流。例如，本书第四章第一节中，作者以专门的篇幅介绍了了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时期，准噶地区同中原地区友好而密切的经济往来，据不完全统计，仅1740～1750这十年间，准噶尔后有贡使在肃州贸易八次，参加定期互市四次，贸易额由数万两增至二十余万两。要而言，作者在书中通过史论结合的说明，鞭辟入里的分析，附以确凿有力的文物图片和统计图，雄辩证明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之间友好往来和相互依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样的命题的正确性，对于促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有积极意义的。

过去，我国历史学界曾就清代西蒙古史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对于其的某些人物颇有争议。《史略》编写组的同志提出了评价准噶尔历史人物的三条标准，：“一、客观上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二、是否有利于本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对外来侵略势力的反抗和斗争”（杜荣坤《关于准噶尔历史人物的评价问》）。正是根据这样的标准，本书作者注意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加以认识，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评价的全面、客观和公正。例如哈喇忽剌之子巴图尔珲台吉，作准噶尔民族政权的奠基人，由于他活动于国内各种势力激烈角逐的明末清初时期，汉文史对他鲜有记载，作者搜集了大量的俄、英、法、蒙古、托忒和满文资料，基本上掌握了巴尔珲台吉的生平事略。在本书“巴图尔珲台吉时期准噶尔之勃兴”一节，作者指出，巴图珲台吉于1635年登上准噶尔政治舞台以后，及时调整了西蒙古社会的封建秩序，主持制定著名的《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坚持反抗沙俄侵略的民族立场，学习定居民族的物质明，为准噶尔封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作者注意把巴图尔珲台吉的活动事迹与时的准噶尔社会历史进程结合起来，并做到寓议论于叙事之中，使读者对这一历史人物获了比较全面深入和具体生动的印象。

对于学术界有尖锐分歧的那些人物，作者也不是以随便乱贴政治标签或戴空头政治帽子态度简单对待，而是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肃认真的分析评价。噶尔丹掀起的战乱，时间前持续十年之久，波及范围包括整个北疆和西北大部，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作者否定批判了噶尔丹勾结沙俄发动的破坏国家统一的反清活动，但对噶尔丹一生的活动并没有随下结论，以便读者进一步思考探讨。阿睦尔撒纳同噶尔丹则又有所区别，前者反清失败后靠了沙俄。作者利用档案材料，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阿睦尔撒纳叛逃行为。总之，本书作在广泛吸取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较真实公正地反映了准噶尔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其历史作用，这是《史略》一书的特色之二。

本书的又一特色，在于它丰富而深刻的知识性。由于本书作者对准噶尔史有深湛研究，

诸多专题成果相续问世，他们在有关知识和材料的掌握上是有深厚功力的。这一点，在《史略》一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例如，作者在本书第二章的“准噶尔封建制度的发展”一节中，通过对《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噶尔丹珲台吉第一项补充敕令》等文献史料的分析和说明，详尽而准确地向读者介绍了关于准噶尔封建制度下的官制、军制、法律和社会等级制度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专业工作者或许是常识，但对于一般读者、即使是历史学者而非专业攻该民族史的人，也都是新鲜而宝贵而富有启迪性的。此外，本书正文之后有四篇附录，包括“大事记”、“清代厄鲁特盟旗表”，“厄鲁特各部世系简表”和“参考书目”，可以自成一部简明而全面系统的厄鲁特史文献汇编和史料索引，对于专业人员恐怕也是十分必要和极富参考价值的。

无庸讳言，本书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其缺点和不足。我们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史学领域的繁荣发展，有关西蒙古史的各种论文，专著和译著纷纷发表，在国内关于准噶尔史的全部论文、译著、资料中，八十年代以后发表的占一半以上。就资料来说，在此期间，蒙文、藏文、托忒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古籍，相继整理出版，将本学科的研究引入更深的层次。但《史略》一书成书于七十年代，由于各种原因，1985年才得以问世，因此未能及时吸取和利用近年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资料，这是本书的第一点不足之处。其次，本书虽然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准噶尔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风情等各个方面，但综观全书，仍是偏重于政治史的研究，对其他方面的探讨尚嫌不足。第三，在体例上还存在需要改进之处。作者的意图似乎不仅仅是局限于准噶尔一部历史，而是要把目光放在包括其他三部在内的完整的西蒙古史的论述上，倘若如此，则使人对书中关于迁往青藏高原和硕特部和迁往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等历史的论述，在内容比重上有不够满足之感。此外，书中某些具体细节的安排似可再加斟酌，比如本书最后一节，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一节内，把作为原始宗教遗拾之一的“鲊答”、“鄂博”一类具体的宗教习俗现象，以单独的小标题与“嫁娶”、“丧葬”、“禁忌”之类抽象层次较高的标题并列在一起，似乎不甚妥当，如将前者概以“原始遗俗”的题目，把“鲊答”等现象作为这一题目下的典型例证，或许会更好一些。然而上述缺点和不足，不过是白壁微瑕，在再版时略加补充和修改，即可免去的。

综上所述，《史略》是一部成功之作，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它的出版将会推动我国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对于西北边疆史以至整个清史研究，也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